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推荐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主编◎焦扬
副主编◎曹培章 总策划◎吴士余

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

刘海滨◎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刘海滨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

(上海青年出版人学术丛书)

ISBN 978-7-5617-7153-2

I. ①焦… II. ①刘… III. ①焦竑(1540~1620)—思想评论 IV. ①B248.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7420 号

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

著 者 刘海滨
责任编辑 宋坚之
责任校对 王 卫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2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7153-2/B·511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内容提要

从某种意义看,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时代。经济和民间社会的发达,思想文化的极度活跃,与平庸暗弱的国家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本书尝试选取思想史的一个特殊角度透视这个时代的文化现象,寻绎背后的历史脉络。而这一考察角度又以一个典型人物的生平为线索展开。

为了更好地把握晚明思想界的特征,本书首先引入了一个“王学会通派”的概念。所谓王学会通派,是指王门后学中公开倡导会通三教的一个思想派别,该派有三个主要的思想特点:一是追求超脱生死的精神境界,二是会通入世出世,三是宣扬无善无恶论。而“会通”除了用来指称王学的一种理论形态以外,还表明了一种对待思想资源的态度与思想方法。这种态度与方法大致有两个特征:一曰求真,即打破一切人为的限制,平等地对待各种思想资源,唯“真理”是求;二曰自主,要求打破权威对真理的垄断,否认既成规范天然合法性,自作主张。这种态度和方法可能摆脱原来的理论目的,超出自身的理论范围。由此引出另一个概念:会通思潮。本文所谓“会通思潮”,是晚明思想学术各领域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会通派王学的影响,采用会通的态度和思想方法对待理论、学术,在各自领域进行理论和学术创新或改造的思想潮流的总称。

焦竑是王学会通派中的一员健将,又是一位治学范围极广、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和当时颇具影响的文学家;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会通思潮对于晚明思想学术各个方面的影响。同时,他生前交游广泛,影响巨大,号称东南儒宗。

本书以焦竑个人生平线索贯穿和展现会通派王学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以焦竑为典型探讨会通思潮对于晚明思想学术的影响;通过展示会通派与师道派、东林派等不同思想的交锋和纠葛,探讨会通思潮对于中国思想学术的意义、启示,及其消退的原因。本书从第一章至第四章将焦竑的生平分四个段落,一方面以焦竑的生平活动顺序为经,师

友交往关系为纬,通过其成长、交游阐明其思想渊源,以其师友为参照,通过比较,说明其思想学术的特色;另一方面通过焦竑的经历及其交游展现会通派王学的兴起和壮大的过程。第五章对焦竑思想学术作一个总结,探讨其学术的各方面与其理学思想之间的关系。第六章交待王学会通派的衰落过程。余论探讨了会通思潮在明、清学术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序 一

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当西元 1611 年，徐光启给《澹园续集》作序，说是自古有益于时代的文章分三种，如司马迁、班固、贾谊、陆贽的“朝家之文”益于德，董仲舒、范仲淹、程颢的“大儒之文”利于行，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的“大臣之文”济于事，“其能兼长而备美者，近世见阳明氏焉，于今见先生”。

这位澹园先生，就是时年已七十二岁的焦竑。十四年前，徐光启参与万历丁酉科的顺天乡试，正是副主考焦竑从落卷中发现其文乃杰作，拔置第一，俗称解元。再过七年，徐光启成进士，选庶吉士，随即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散馆授翰林院检讨，继在丁酉期间潜心研究欧洲数学天文和引进域外甘薯等高产作物。这年他五十岁，回京复职，正值利玛窦去世，他便成为中外西教西学人士的核心人物。

因此，这时徐光启解读座师焦竑晚年自选文集的著作意向，对其中的“理学家言”，以“备”字带过，却特别表彰集内没有说空话的“文士之文”，兼有史德、儒行、救世三美，以为“近世”即明朝二百多年间，唯有焦竑与王守仁并称“文章之龙”，可谓既不忘本，又有分寸。

值得注意的是焦竑对徐光启序照刊不误。就在徐光启中举那一科，焦竑被权臣指使言官弹劾“取士非人”，闹到遭贬放逐，终于在六十岁那年（1599）辞官回南京老家。他并未真正韬晦，依然结社论学衡文，除与李贽继续密切交往，还会见已在南京建立耶稣会住院的利玛窦。次年春间，徐光启赴留都探望焦竑，自述初次“邂逅”利玛窦，是否同焦竑有关，不清楚。但过了两年多，徐光启再赴南京访问利玛窦，虽不遇，却在利玛窦所建教堂领受洗礼，从此改宗西教。以后又力邀南京住院神父到上海“开教”，甫中进士、点翰林便与利玛窦合作译书，这都当为焦竑所了然。正如李贽因“异学”迭受当局打击以至下狱自刎，焦竑还是不避嫌忌而予以支持一样，焦竑也不因徐光启早已皈依外来“异教”而对他

歧视。

难怪明清易代之后，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强调学贵“自得”，却将晚明王学反思孔子朱熹的经学传统最具广度深度的李贽屏除在外，也将晚明西学标榜“易佛补儒”最为自觉有力的徐光启革出“儒”门。书中“泰州学案”给焦竑立传，除了说他“笃信卓吾之学”实为悖师（耿定向、罗汝芳），特别揭出他对待王学先驱程颢不恭，说他否定程颢辟佛语乃不知“异国土风”，恰证他“生于中国”而主张“服桀之服”，一引朱国桢语指他“偏见不可开”，再引耿定向语讥他为当世“说不听，难相处”的三个人之一。

更难怪时至清乾隆晚年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仅在经部小学类承认焦竑继杨慎之后对文字学有见识，并称道焦竑对陈第《毛诗古音考》“能通其说”——其实陈第自述论古音实受焦竑“古诗无叶音”说的启迪，而将焦竑有关经史诸子的几乎所有论著，不是列入“存目”，便是宣布“禁毁”。理由呢？说来很堂皇，还是辟异端，而晚明最大异端要数李贽，李贽生前死后刊布的正续《焚书》、《藏书》，又都由焦竑率先推广。“焦师耿定向而友李贽，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竑亦至尊崇杨、墨，与孟子为难。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焦弱侯问答》提要，《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二）但满洲皇室权贵不是世代尊崇萨满巫术吗？满洲叛明并乘危夺取明朝天下不是“无父无君”的典型吗？满洲入主北京后不是将《三国演义》描述的关羽奉作天神而祭孔仍算“中祀”吗？乾隆晚年越发倡导个人迷信，不是把喇嘛教所谓千里之外夺人魂灵的咒语当作镇压民间造反的神术吗？李贽和焦竑的所谓“狂禅”，不过以为传自西域的佛教，连同域内传自老庄的道教，都合乎孔孟的原教旨，并以为融会贯通本朝三教，所谓“礼时为大”，才算救世真理。

焦竑与李贽是忘年交，曾这样赞美长他十六岁的李贽，“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论语》记孔子如此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照孟轲的诠释，孔子是因为找不到行为执中的朋友，就表示宁可退而求其次，争取同不计利害而执着理想的狂者为伍，否则就结交遇事不可做就决不做的耿直之人。焦竑显然认定李贽合乎孔子择友首选狂者的标准，称他可以“坐圣人第二席”。据这一评价，《四库全书总目》作者显然推论焦竑自居狷者，堪充圣人孔子的三席候补者，岂不妒火中烧？尤其是纪昀等《总目》作者，都是汉学家，都以文字音韵训诂考订辨伪目录诸学当作看家本领，却发现明中叶杨慎以后，早有学者分别从事斯业，至焦竑可谓初集大成。倘

若不否定焦竑，怎可说明学“空疏”，到我大清圣君出才“公理”明呢？于是焦竑论著非禁毁不可。

上世纪初，“排满革命”的首席理论家章炳麟（太炎）综述清朝学术变迁史，概括满清二百多年的文化特色：“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蹕善矣。”（《清儒》，《馥书》重订本）前三则针对满清统治文化政策的否定，无疑是与晚明王学盛行时期状况相比较所作出的判断，涵泳着对晚明思想文化活跃而多元的历史的肯定。然而同一时期章炳麟所作的《王学》，却对晚明王学思潮的开山王守仁的学说同样赋予负面的批判，甚至说王守仁仅有“致良知”可算自得，其他见解没有一点不是袭自古人旧说，较诸王守仁攻讦的朱熹支离学说还要不成系统。王学或如日本人习称的阳明学，大成尚且如此，随起各派当然更难称道。因而，章炳麟认为清代学术唯在“说经”有卓越成就，正如稍后刘师培指出并为章炳麟也同意的，事实上在晚明已有杨慎、焦竑、陈第等充当前驱。关于章炳麟“议王”的历史认知矛盾，拙作《章炳麟与王阳明》、《〈馥书〉发微》诸篇，已指出要从上世纪初他与康有为的论战中寻求合乎历史实相的解释。

戊戌前，章炳麟憎恶康有为，一个原因就是康有为醉心于王学，称之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章炳麟于是斥康有为李贽式的“狂禅”，“狂悖恣肆，造言不经”。当然，庚子年（1900）章炳麟因反对康梁保皇而誓志“排满革命”以后，至辛亥前十年间，无论著书办报还是论政讲学，不忘“订孔”，实则“订康”，怎不继续贬斥阳明学？那时期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对清末民初思想文化转变起直接影响的，莫过于在东京讲学的论作，其中坚持“遣王氏”，也就仍然抹煞焦竑等人对于清代汉学起过催化作用。虽然进入民国，他开始承认阳明学于明清之际学术进化并非只是负面效应，甚至说晚明学风崇尚耿介，接近古人所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正表明王守仁的“术”，可贵处在于“敢直其身，敢行其意”。而焦竑与李贽的交情生死不渝，是否章炳麟隐指的一个例证呢？

不过，“五四”以后，多半曾为章炳麟的朋友和学生的那班新青年，不管政见各趋异途，却对晚明学术多持冷漠态度。这与其说是摆脱不了太炎师说影响，不如说是厌恶国民党立足南京后的意识形态主流。谁都知道蒋介石标榜正统道统都得孙中山嫡传，而孙中山晚年力倡“知难行易”，自谓深化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于是蒋介石为实现独夫专制而排除异己，便大树特树王守仁加曾国藩的理论权威。这连以温和的自由主义著

称的胡适也难以忍受，在“五四”第一个十年祭的民国十八年，同蒋介石的文化婢仆，展开历时年余的笔战，他的名文之一，便是由孙中山说到王阳明的《知难，行亦不易》。不言而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学界才有人记起晚明“左派王学”即包括李贽、焦竑在内的泰州学派体现的集体抗议在朝理学的批判精神，从而晚明王学史，也在海内再生。

那以后，迄今七十多年，晚明王学在海内外研究渐多，由刘海滨这部《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篇前陈述的研究史，可窥一斑，不赘。

那是近半世纪的往事了，我从周予同师编选《中国历史文选》，被迫通读明清经史文献，随与同事接着陈守实师讲授中国史学史，非通阅晚明到清末的正野诸史不可。明中叶后思潮的光怪陆离令我诧异，清前期四朝经汉学通过不断否定经宋学而因思成潮，更使我好奇。但直到“那十年”堕入牛群（牛者，牛鬼蛇神之俗称也），如鲁迅所讥“无聊才读书”，去重读十三经二十五史，忽悟周予同师昔谓经学已死，经学史研究应该开始，堪称至理名言。因而年逾不惑，恢复教职，除续讲中国史学史，又开讲中国经学史，而角度也尝试置于中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范畴之内，并向外延伸，尝试与同时代的域外思潮作比较。

自我恢复教职，首先带教的外国高级进修生，都是欧美的博士候选人。但接着招收的国内研究生仅限于攻读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硕士，因为当年利于个别不学有术的冒牌权威把持以营私的学术评价体制，硬行否定复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应有的博士学位授予权。经过多年曲折，我主持的研究室才得以设置以思想史、文化史、经学史和学术史为方向的专门史博士点，接受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者。其中便有日后的刘海滨博士。

依我的陋见，无论硕士、博士还是博士后为名的研究者，都应赋予选择研究课题的自由，尽管这总使我自讨苦吃。刘海滨选择研究焦竑，将重心定于他赞同的“晚明会通思潮”，在我必须先读晚明所谓三教争论、包括利徐表征的西学在焦竑的回应的种种材料和后人论述，便是一例。

不过我也认定史学论文不可用逻辑代替历史。因而要求研究生做论文，最低限度应该实现论从史出，无征不信。刘海滨的《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注意到守此规范，同时对我的已有说法力求“接着讲”。

所谓接着讲，关键要立新意。我曾说，焦竑个人的学说，论传统无非李贽否定孔孟之道的回声，论新意也止于容忍利玛窦、徐光启引进的西学。

刘海滨对焦竑是否赞同门生徐光启改宗的西教西学存而不论,而将研究重心置于晚明儒佛道三教“会通”的取向、效应、得失和内在矛盾,在前也由我忝居导师的邓志峰的博士论文(已出版,改题《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已从宏观角度对此作过考察。如今刘海滨循同一思路的微观研究而作此书,尤其是对焦竑生平思想各个侧面的考察,每个侧面都力求指出焦竑对时代思潮所作的特殊贡献,无疑有助于晚明王学史研究继续深化。

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四年之后,刘海滨拿出他多方修改的这部同名书稿,命我作序。我没有理由拒绝,只好费十日夜重读晚明王学相关材料和后人评论,草此小文,实为读后感,非序也。

朱维铮

农历己丑八月寒露三稿

序 二

一般学者对于焦竑的印象，大多不出其晚年所作的《国史经籍志》、《献徵录》、《玉堂丛语》、《焦氏笔乘》等征实著述，以《国史经籍志》为例，乃谈古典目录学所必称，然亦仅将其作为明代史志目录之代表而已，《四库》提要对其评价其实并不高：“顾其书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世以竑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由此可见，在思想史之外的学人眼中，焦竑不过是“负博物之名”者而已，对于其作为思想史方面的影响和成就了解甚少。海滨的《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由此着力，阅后收获良多。但我并非以治思想史为专业，故个人的感受并不具权威性，对于这部专著的学术价值评判，要听专家的意见，我没有发言权。

记得在插队时曾对思想史有过一段兴趣，动因好像是源于当时“读一点思想史”的号召，所读过的书有汪子嵩等的《欧洲哲学史简编》、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等，多半也因为只有这几本书可供这方面的阅读选择（多卷本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是在大学时读的，但没有全部读完，那时的兴趣已经不在思想史方面了）。到了“批林批孔”时，又浏览了先秦诸子的一些著作，以及重印的《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说老实话，如果不是“批林批孔”，当时恐怕也读不到那么些古典原著，尽管有的只是选本。1978年进入大学，学的是历史，后来研究生读的是古典文献学，思想史修养只是专业知识的一种背景，再也没有深入下去。当然，这也和我个人的一点“偏见”有关。窃以为，不仅是思想史，就是在我专业接触的史学、文献学中，也动辄大谈什么“某某思想”，这些所谓的结论究竟是否可靠，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人的思想是十分复杂且经常在变化的，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本人究竟有什么思想，百年之后、千载之下的人，怎么能说得清呢？所以凡对于谈论“某某思想”的，一概略去不究。后来读到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大感惬意，其谓：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海滨在本书的导论中，提出焦竑的研究在局部方面“已经得到较充分的讨论”，但“因为对焦竑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各方面的专门研究也就难以更深入”，窃认为是切中要害的。所谓“整体的把握”，应该与陈寅恪所说的“应具了解之同情”涵义相近。海滨的研究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可以评判，但其研究的方向是对头的。

我和海滨在编辑工作中有过一次合作，虽说不上了解深入，但有起码的第一感受。他的编辑思路清晰，处事有条理，在专业方面有一定的学识基础，如果能专心治业，相信会有所成就。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我们于编辑亦可以说“学而优则编，编而优则学”。

承海滨的信任，邀我为他出版的第一部著述作序，我于思想史并不专业，只能说一些自己的感受，以与海滨及同志者共勉。是为序。

金良年

(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

2009年7月20日

目 录

序一 朱维铮 / 1

序二 金良年 / 6

导论 / 1

第一节 研究史 / 1

第二节 王学会通派 / 5

第三节 会通思潮 / 10

第一章 少年问学 / 14

第一节 行伍世家的读书种子 / 14

第二节 江南文化的熏陶 / 16

第三节 耿门弟子:稍知向方 / 20

第二章 会通之路 / 27

第一节 第二位老师:罗汝芳 / 26

第二节 亦师亦友 / 30

第三节 焦竑与李贽 / 36

第四节 思想枢纽:从焦竑的交游看会通派的壮大 / 42

第五节 焦竑与耿、李论争 / 45

第三章 宦海十年 / 61

第一节 焦竑与性灵文学的兴起 / 61

第二节 经世理想的破灭 / 65

第四章 退居林下 / 72

第一节 耶稣会士来华与会通思潮 / 72

第二节 焦竑与徐光启 / 78

第三节 焦竑与陈第 / 89

第五章 道与文:焦竑思想学术之总结 / 94

第一节 焦竑的理学思想 / 94

第二节 文学与理学 / 105

第三节 博学与理学 / 116

第六章 会通潮落 / 122

第一节 各种反会通派 / 122

第二节 见证会通派的衰落 / 129

余论 / 135

附录 焦竑年表 / 138

征引书目 / 156

后记 / 164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史

思想史上常见的“名人”有三种类型：有一种人生前身后都赫赫有名；另一种人，生前很有名，死后却默默无闻；还有一种人，生前几乎无人知晓，死后却名传千古。就本书涉及的时代而言，前一种比如王阳明，后一种比如王船山，而本书的主人公大约属于中间一种类型。究其原因，大概有三点：就其思想而言，他不是开创时代的人物，理论也比较持平、全面，因而缺少耸动人心的力量；性格上也较宽厚温和，缺少他的好友李贽那样奇异的人格魅力；加之生平经历的相对平稳，缺少跌宕起伏的传奇色彩。但却并不因此贬损他独特的研究价值。他虽不是开山立派的宗师，其思想也自成一家，并且具有多方面的造诣和成绩，在其所涉足的诸多领域都具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就他本人而言，因为各方面的成就集于一身，使他极具典型意义，适足以作为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他的广阔的交游网络以及他漫长的一生经历，又使他成为了空间上关联各方面和时间上承前启后的思想学术枢纽。

尽管焦竑在明清学术演变过程中的地位早有学者注意^①，但真正意义上的焦竑研究开

① 《四库总目提要》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源流时，在杨慎、陈耀文之后提及焦竑，虽仍其一贯意见，对焦竑的评价不高，但仍承认他对于清代考据学的先导作用：“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一一九《子部·杂家类三·通雅》，页1028）后来钱穆还引用这段话反驳梁启超，认为清儒向来自认其考证之学沿明中叶杨慎诸人而来，而非由清人自己开辟。（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150—151。）

始于民国时代。容肇祖的《焦竑及其思想》最早编订焦竑年谱,并评述焦竑思想,开焦竑研究之先河。容氏将焦竑思想概括为会通儒佛、博学返约、注重实际、反对放浪无忌惮等几方面,并认为其博学与其向内的思想是统一的。^①后来学者论焦竑思想,鲜有突破容氏范围者。^②

较早注意到焦竑的还有文学研究界。由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晚明文学热,有学者因追溯公安派的思想渊源而提及焦竑,如嵇文甫在一篇短文《公安三袁与左派王学》中将焦竑划归左派王学系统,并提及他与袁宏道的师友渊源。^③其后郭绍虞于1947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郭氏将焦竑作为“公安派之前驱”之一,开始对焦竑的思想、文论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的内在联系有了较深入的探讨。^④九十年代以来,沿着这一方向,对焦竑与性灵文学思潮的关系给予了充分的注意。^⑤

除了上述两个研究视角,海外学者对焦竑学术的专门研究开展较早,也更深入,^⑥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台湾有几篇硕士学位论文,分别针对焦竑思想学术某一方面进行专题研究,^⑦林庆彰在其《明代考据学研究》中专辟一章,对焦竑的考据学成就、特点、

① 参见《容肇祖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原载《燕京学报》第二十三期(1938年)。对焦竑思想的论述另见容氏四十年代出版的《明代思想史》,见齐鲁书社1992年重印本,第七章,第四节。

② 比如牟钟鉴:《焦竑的主体意识和求实精神》,见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济南:齐鲁书社,1989)。李焯然《焦竑的实学思想及其对晚明学风的影响》,收入《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稍有不同的是张学智《焦竑的儒释道三学》,专论焦竑的心性学思想,比容氏更细致深入,并特别阐发了焦竑“礼的形上学解释”,较有新意,见氏著《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十九章。另外,影响较大的思想史著作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页1036—1037)、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163。本书日文版1971年由明德出版社出版),对其思想有简略评述。前者将焦竑作为李贽的知音和同道,表彰其异端思想,后者将焦竑归为所谓王门现成派系统下的容禅派,均着眼于焦竑会通三教的思想特点。

③ 见嵇文甫:《公安三袁与左派王学》,收入吴承学、李光摩编:《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原载《文哲月刊》第1卷,第7期,1936年8月。

④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页220—224。原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⑤ 其中值得注意的著作有:《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左东岭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周群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性灵派研究》,吴兆路著,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⑥ 中国大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于焦竑的史学、文献考据、音韵学等方面也有一些论文发表,但研究不很深入,大多属于介绍性质,此不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现居新加坡的李焯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撰写了多篇对于焦竑的思想、学术的介绍,参见氏著:《明史散论》(台北: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⑦ 李文琪:《焦竑及其国史经籍志》,(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86年硕士学位论文(后由台北:汉美图书公司于1991年出版)。施锡美:《庄子翼研究》,(台湾)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4年硕士学位论文。洪芬馨:《老子翼研究》,(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6年硕士学位论文。谢京恩:《焦竑与佛教》,(台湾)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

缺失作了详尽的论述。在此之前,余英时曾以焦竑为例阐明其关于明清学术转向和清代考据学的渊源的观点。余英时在《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一文中,以焦竑为例考察明中叶后所谓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说焦竑在心性之学方面可说是一结束人物,在博学考订方面却是一开创新人物,并因此认为其学分为“两概”,有内在矛盾,焦氏的出现象征着儒学从“尊德性”阶段到“道问学”阶段的过渡。^① 余英时的说法被一些学者接受,比如前述林庆彰对于焦竑考据学的研究就完全采纳了余氏的观点。但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意见。钱新祖(Edward T. Ch'ien)认为焦竑的道器一贯说是一种“气一元论”,并因为这种本体论而导致他的考证学,并因而说明考证学源于陆王心学。^② 钱氏的观点发表后遭到余英时的强烈批评。除了对钱著的史料运用以及论证过程提出质疑以外,余氏的反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认为焦竑的考证兴趣并非来自其哲学立场,焦竑作为理学家、考证学者和文人可以分别从明代的哲学、考证、文学这三个学术潮流来理解,三者虽非无关但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二、关于气的一元论与考证的关系,他认为气一元论源于明代的程朱派学者罗钦顺,因此如果从理学传统中找寻考证的根源,与其强调陆王还不如强调程朱,并且他认为将焦竑说成是气的一元论者是值得怀疑的。^③ 这里双方的讨论范围早已超出了焦竑的个案,或者毋宁说双方关心的重点在清代考据学的起源问题。^④ 涉及到明清考据学的比较问题,周启荣(Chow Kai-wing)认为明代杨慎、焦竑等人的考证与清代考据学只有技术上的联系,而两代学者对于考据的理解以及运用考据所要达到的目的都不相同。^⑤

这些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了焦竑思想与学术的各基本方面,另外如焦竑与传教士及

① 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案,该书于1975年在香港首次出版。

② 参见 Edward T. Ch'ien, *Chiao Ho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③ Yü Ying-shih,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Chiao Hung Revised: A Review Article*, in *Ming Studies*, No. 25 (1988), pp. 24 - 62.

④ 关于考证学的渊源问题,民国初年以来倍受学者关注,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黄克武对此曾有详尽的介绍和简明扼要的总结,参见氏著:《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十一期(1991: 3)。

⑤ 参见 Chow Kai-wing, *Yang Shen and Chiao Hung: Various Uses of Philology in the Ming Period*, 《汉学研究》第10卷第1期(1992年6月)。